

Zhishi Shehuixue
Shiye zhong de Wenxuejia

知识社会学 视野中的文学家

——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

詹七一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知识社会学 视野中的文学家

——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

詹七一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怡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学家: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詹七一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

ISBN 978-7-01-014096-4

I. ①知… II. ①詹… III. ①作家-人物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6668 号

知识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学家

ZHISHI SHEHUIXUE SHIYE ZHONG DE WENXUEJIA

——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

詹七一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5

字数:235 千字

ISBN 978-7-01-014096-4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七一兄是我的师兄,为人为学皆如此。兄之事即我之事,兄所嘱之事不能不做。2007年,七一兄告知他的课题“文学家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是新成立的昆明学院中文学科第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闻讯马上驰贺。今年初,七一兄电告课题已结项,文稿列入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嘱写一短序。师兄之作之序不当由我写,之前两位昔日师长让我作序皆不敢应,但平素谦和的七一兄异常坚持,不能不从。

知识分子问题关涉自己的衣食饭碗,故历来为我所挂心。可能同一原因,这也成为知识分子们讨论的热门话题,论者众多,成果丰硕。角度不同,立场各异,对话者有之,自说自话不少,有遵从理性逻辑者,亦有情绪宣泄者。从知识分子谈到中国社会,从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谈到社会文化,再到体制、社会、中国的前途……深入的同时,也歧杂纷繁,竟至知识分子是什么,谁是知识分子都不清楚了。七一兄的论题是“知识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学家”,虽然最终落在文学家,但核心实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社会职能、思想行为与社会文化制度的关系。这自然让我殷殷期盼,希冀解我之感。

看了七一兄之作,确实加深了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认识。从他对知识分子谱系的梳理,我大致了解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由来。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分子是个舶来品,在中国出现才一百年出头。中国古代并无知识分子,现当代知识分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具而言之,中国知识分子的来源有二:中国古代的“士”和西方的“Intellectuals”,是两者的混合体。士源于巫,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士脱离周室而自存。唐代科举大开,士人逐步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群体。宋代以降,科举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士大夫”最终形成。1905年科举制度终结,士大夫阶层失去政治制度保障。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形成。罗志田对清末民初读书人命运的研究就有力地说明了问

题。过去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多聚焦于观念而非社会,为重名而失实。七一兄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但这其中尚需注意传统的士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古代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学而优则仕’,是以宦海生涯中的成功作为学问的目的和标准。学与仕是知识与政治的合二为一,于是,士大夫很难有超脱政治体制之上或之外的独立批判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即脱离政治体制而有可能获取相对的独立性,则又未尝不可视为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之必要条件。”但七一兄时称“士”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混淆两者之嫌。(许纪霖等人也时把古代士人等同与知识分子,在类比的意义上可以成立,但前提是明确两者质的区别。)其实,他在书中已明确指出,“以我们的愚见,中国古代的士和现代知识分子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知与行的分或合,也就是思想与行动是否有明确区分的问题。理解这一区分对理解从事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命运有启示意义。”“知行合一”与“知行分离”的根本在于“士”和“知识分子”所属社会和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古代中国是王朝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士人上升的唯一途径是做官,为统治阶层的有机构成;现代中国则转向公民国家,知识分子上升空间很大,不必非得做官,可以外在于统治。对于士来说,学问是为官的准备,学而优则仕。仕之前议政,仕之后参政,达则兼济天下。属意学问是仕途不济的无奈,穷则独善其身。士与大夫一体两面,士是大夫的基础,大夫是士的目标鹄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议政是为社会服务的方式之一,知识是学问的目的,专意学问是主动的追求。知识分子是现代性的体现,是现代化的必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换言之,中国古代社会不可能有所谓的知识分子。

因此知识分子的产生,实拜社会转型所赐。知识分子超越古代士人之处,并非知识分子道德高尚或因其西来,而是现代性所规定,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决定的。当然,这并不意味中国知识分子与古代士人没有任何关联,知识分子身上明显有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痕迹,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之、梁漱溟、梁思成、储安平等等就是明证(虽然个体差异同样明显)。民国皇权不存,军阀割据,全国缺乏唯一的权力中心,权力分散,致使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士人低,但实际权力较士人高出许多。

加之抗日救亡、国内战争,知识分子希冀重建社会,创造一个新的国家。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的独立、20世纪50年代初经济的腾飞、思想改造输入的身份原罪感等使其主动被动地抛弃民国时期的独立性。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彻底摧毁了数千年发展起来的社会基础,所有的民间组织都被解散,民间社会不复存在,社会结构根本改变,与此同时,传统道德在新的意识形态旗帜下被强化。严格说来,全控型时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有的只是政治的代言人——这与古代士人无异。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重构统治合法性而进行现代化,知识所赋予的权力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知识为全民所追求,重新出现的知识分子为帝王师、在政治权力庇护下重建社会重心、实现自身理想的士人精神再次唤醒,传统的权力倾向强化。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优越想象,不认为自己是大众的一部分,总想领导大众。这种想象被严酷的现实击碎后,知识分子精神在分化了的部分知识分子那里复苏。南巡讲话后,统治的合法性从政治转向经济(这一点为七一兄在文中明确指出),利益的多元化推动权力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改变导致社会的出现,知识分子产生的社会基础出现,知识分子藉人文精神大讨论再次登场。这些年来,知识分子逐渐分化,正是常态。

到此可以明了,从逻辑来说,先有对知识分子谱系的梳理,后才能对知识分子做一界定。但实际操作正好反过来。这正说明了概念的非封闭性。除了数学和逻辑概念,其他概念都是开放的,时间性与非时间性并存。概念的非时间性保证了标准的普遍性,概念的时间性凸显出事物的特殊性。知识分子的普遍性与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差异,古代士人的类知识分子性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士人性,使得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异常复杂。这一方面说明并没一个本真的知识分子,也说明没有一个明确的知识分子概念,讨论就无法进行。对知识分子的不同界定,直接影响对其所属阶层的定位和对其权力、功能的判断。七一兄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我非常同意的,“为便于讨论,根据学界关于知识分子的重要论断及其已然种种特征,我们试图对知识分子作出这样一种限定:自觉从事知识探求并具备公共关怀的人或某一社会阶层。由此,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在真实发生的语境

中,这正是知识分子近代以来所履行的社会职能。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有相当程度的区别,凸显出其特有的精神内涵。”但七一兄的这一标准似未在文中一以贯之,时有矛盾,当然,这没有影响主旨和全文的逻辑。七一兄以文学知识分子为例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说明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窃以为较大多文学思想史和文学史研究更为深入和具有同情性(即陈寅恪的“了解的同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对文学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倘说开题时我担心对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家的文化生存的影响和意义论述不够,但现将其大作细读几遍后,这种想法一扫而光。如果说从对鲁迅和周作人的讨论未能给人更多惊喜,对丁玲心路历程的探讨就有不少新的发现,对张承志和张炜的讨论精彩细微,见人未见。指出张承志、卫慧和韩东与丁玲和赵树理的区别,“首要的区别是生存方式:前者生存于体制之外,后者生存于体制之内。若脱开体制,丁玲,尤其是赵树理似乎无路可走,体制给了他们一切,或者说最根本的身份;而张承志、卫慧和韩东则有了回旋的余地,可以作出其他的选择。这个余地可能就是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再次形成的相对独立于国家与个人的所谓‘市民社会’(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上的‘civil society’,但具有‘civil society’的某些重要特点)。丁玲和赵树理的身份认同最终发生在体制内,受到体制规范的严格限制,张承志他们虽然不受这种限制,但不管厌恶还是喜欢,拒绝还是认同,他们都必须与文化市场发生关系,并在文化市场的关系中确立自己的真实身份及其功能。”“前者的身份不是单一的,他们是作家更是国家干部,从社会功能上讲,更接近中国古代的士,把他看成官员型作家或许比较恰当。而用官员型作家来指认游离于体制外并声称‘永不近官’的张承志以及卫慧和韩东,则极不恰当。从社会功能上讲,他们更接近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作家或自由撰稿人(freelance)。对于丁玲和赵树理来说,双重身份的重量是不相等的,官员远比作家重要,作家从属于官员,用丁玲的话说,就是‘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在丁玲、赵树理那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革命工作与文学创作是一致的,从事文学创作就是从事革命工作,为党和国

家服务,为人民服务;即使有时在创造中揭露点阴暗面,对上对下都有所批评,其用意也是调适上下之间的矛盾,以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对于张承志、卫慧和韩东等自由作家来说,“无官一身轻”,限制他们的已不再是什么体制规范,而是在社会分层过程中兴起的文化市场。”认为相对于丁玲和赵树理,张承志与卫慧、韩东是一路人,“都是不受旧体制限制的自由作家或自由撰稿人。对待文化市场的态度。亲近?疏远?还是不即不离?卫慧、张承志和韩东恰好代表了这三种类型。张承志是作家,却更像斗士:以教徒般的热忱承担道义。……卫慧是作家,却更像商人。……韩东和张承志等老知青的不同在于,张承志所代表的老知青写作,始终没有打算离开文化的中心位置,无论是流浪还是回归民间,他们写作的最终目的都是携带着生命的荣耀返回中心位置。而韩东的写作无意于话语权的抢夺,以‘游走者’的身份,表达独立于体制和主流之外的边缘立场,在与中心二元分立的格局中确立自己的身份意义。”这些文字,就是方法的重要性。

当然,七一兄对中国知识分子의复杂性的充分认识和精微分析,辩证而不极端,不仅仅是方法问题,更是对社会人生的深切感悟所致。难能可贵的是七一兄的理想主义,书中他不吝言辞赞美那些与自己一样的理想主义者:

韩少功以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和睿智致力于开掘被意识形态话语长期遮蔽的民间话语形态,表达了自己对语词意义上的“马桥世界”的批判而又夹杂“同情的理解”的复杂心态,曲折地表露出作家主动疏离主流文化立场和大众流行话语,投身于广阔、丰富、深邃而又“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并以“民间文化形态”作掩护重建人文话语空间的良苦用心。意志力强悍的残疾作家史铁生,生活在自己的“圣洁之地”,拒绝世俗的浊流侵入心灵;他充满激情地“从自己的灵魂中本原的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理想,并用它来衡量或‘说’我们这个千古一贯的现实。”我们在他的《务虚笔记》中能够感受到一种近乎“纯净”与“神圣”而又强劲的语言张力,这种似乎是来自“彼岸”的语言逼迫人们抛弃所

有惬意的幻想、无聊的期许和懒惰的诱惑,发自本能地投入一场痛苦不堪却又无可回避的灵魂拷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20世纪90年代这一批“新理想主义”作家的“斗士”姿态和不无悲怆的呐喊,实际上就是人文知识分子世纪末灵魂震颤的表征,是转型期中国作家多元化生态格局中之一“元”。他们堪称霍克海默、阿多诺所指的“知识分子最后的英雄主义者”。……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兀然崛起的存在、他们铿锵刺耳的“呐喊”,为在历史迷宫中失却精神家园的中国知识分子振聋发聩地敲响了关乎自我身份认同和价值选择的警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了文化界一道神圣庄严的“布景”或精神象征,赫然昭示着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确证以及对人类基本价值的承诺与坚守。

虽然本身秉持理想主义,但七一兄并不因此走向偏激,而是冷静地指出:

作为一种表达个人向往的理想主义追求,这些“精神圣战”者坚决捍卫理想和信仰、敢于承担痛苦与孤独的决绝姿态和无畏气魄,即使注定无法与急速物欲化的生存现实相抗衡,至少应该获得良知未泯的人们,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感动”和理解,也至少可以使“无耻者”和“堕落者”感觉到哪怕是一丝的惶恐与忌惮。然而,我们同样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新理想主义”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符号或标识,固然在物欲膨胀、信仰阙如的历史语境中凸现出了断然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但在这个群体的极端化代表“二张”那里,对现实的拒斥和对所谓“理想”的坚执显然已经发展到了过于偏激的地步。

与七一兄一样,我们这代人多多少少都有理想主义的影子。我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由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但其前身士人从道不从君、谋道不谋食的传统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应该是知识分子应该继承的,西方知识分子自由独立的精神和因信仰而

批判社会及自我批判的传统同样应该继承。

余英时先生有言：“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似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自己主动的。七一兄认为知识分子边缘化的主要原因是统治合法性转移的结果，这当然是知识分子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我认为更为关键的是知识分子没成为思想资源的来源。西方知识分子来源有二：希伯莱的先知和希腊的哲人，前者给了其信仰的传统和社会批判精神，后者给了其理性的传统和求知的精神。他们坚信自己的信仰，以理性反思社会和自我，自我批判和批判社会——包括政府，引导大众走出精神的迷茫。（《神曲》和《浮士德》就是体现）中国古代儒士也有自己的价值体系，礼就是其体现。但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精神信仰，所以只能文以载道，不能给大众提供精神资源，不能引导大众。即便是被知识分子自我神化的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也只是移植了西方的理论（以及思维方式），并没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以至于现在我们只是抽象的怀念，却不能想起80年代给我们留下了追求民主自由的热情之外的任何价值观或思想理论。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对中国知识分子持悲观态度。年初我随团去印度商谈合作办学，印度很多地方确实脏乱差，人头攒动，纷乱不堪，但我在其中感受到一种勃勃生气，这与平静秩序但毫无活力的日本构成相反的两极。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情况与此相仿。宁可乱，也要有生气。有生气，就有希望。眼下权力的多元化使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成为可能，对体制的批判和反思虽然可能是知识分子自我分裂的外现，也可能是知识分子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的开始。当下不少热衷于解构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实为构建新的权力，使自己再次进入权力中心。我们得清楚，自己不是政治权力的掌握者，也不应该处于政治权力的核心，而是外在于政治权力对政治权力的监督者；不是外在于时代社会的旁观者，而是身处其中的建设者。现在需要的，是在思考之中，在论争之中，形成自己的精神追求，形成自己的精神信仰，构建新的价值标准，并以此为依据自我审视、评判社会，创造新的文化。借助于“文学家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这个课题，七一兄已着手此项工作并获得初步成果，近闻他又获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希望他给

我们更多启迪。

看了七一兄之作,有如上感受,若有不当之处,唯祈兄谅解。

王卫东

2014年夏于昆明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知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9)
第一节 知识社会学理论概述	(9)
第二节 知识社会学方法意义	(16)
第二章 知识分子及文学知识分子生成研究	(22)
第一节 知识分子的基本界说	(22)
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认知深化	(42)
第三节 专擅于美感经验的文学知识分子	(51)
第三章 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个案	(75)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迁延的三个基本阶段	(77)
第二节 鲁迅:民族精神的政治解放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84)
第三节 周作人:自由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及其认同与叛逆	(91)
第四节 丁玲:左翼知识分子的认同焦虑与话语重构	(112)
第五节 赵树理:政治意识形态中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130)
第六节 张承志:宗教精神中的终极关怀及其身份认同	(137)
第四章 转型时期的文学知识分子	(149)
第一节 转型期现象:作为社会代言人的文学知识分子	(149)

第二节 书面文化的断裂与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困境及其功能畸变	(151)
第三节 “新理想主义”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生存与身份认同	(154)
第四节 转型期文学知识分子解析	(163)
第五章 中国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	(174)
第一节 新语境中文学知识分子的身份确认	(177)
第二节 职业与志业之间	(189)
第三节 超离社会分工的自我选择	(191)
第四节 非价值空位基础上的边缘立场	(194)
结语	(213)
主要参考文献	(215)
后记	(220)

绪 论

一、研究缘起

晚清以降的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屡有变迁,思想文化亦跌宕迁延,其中,文学活动及文学家的身份、职能则随之漂浮不定;百年文学或沁脾舒郁,或振臂疾呼,引领时代风潮,亦曾百花凋零……而至20世纪末及新千年初,在经济高速增长之时,文学活动及其文学家却遭遇高度边缘化的境况:大众已不再热衷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们更曾提出批评,发出呐喊,文学家则已从诧异、愤懑、挣扎到流于麻木,或随波逐流,或沉默失语。文学,无论是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存在要素、愉悦方式,或是人类审美意识的一种呈现形式,抑或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精神活动,无疑都应当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永恒论题。故在当今文学发展方向较为模糊,人们普遍困惑不解的时期,对于文学家的社会功能研究,尤为重要的一翼。

由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有关文学及文学家的既有观念受到严重挑战,文学和文学家的理念较为模糊,因而,此时对文学家“已有”的和“应有”的形象作出确定的价值判断和取舍,虽尚不够成熟,亦迫在眉睫而亟待深入。我们以为,可行并当行的路径之一,便是去探寻文学家在历史上的各种身份、地位、功能与价值及其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当这样的研究深入展开之后,有关文学家地位与价值的判断和走向,方有可能云开雾散、豁然呈现。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①。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克罗齐这句话,无疑表明人们对历史的关注确与当下密切相关。较之以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创作似乎愈发步入自弹自唱、孤独落寞的境地。而几乎与此同时,文论领域愈发盛行的曾是西方20世纪兴起的“唯文本论”倾向,如俄国

^①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致使“作者”与“社会”等要素^①在文论话语中缺席久矣。上述西方20世纪文论传入中国与中国当前文学和文学家境况并行,固然有理论上的因果关联,但问题的关键是,关注文学家,却是无论从文学内部还是外部研究看,在当今文论领域都十分必要。事实上,就西方现代文论而言,其取向也并非只是“唯文本论”,除了接受美学等(虽非唯文本,但也并未关注作者)外,还有一个有待深入的重要领域,那就是我们所欲鉴借的“知识社会学”。尽管社会学之知识研究大多未直接涉及文学领域,但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进行文学研究,亦应构成当代文论多元研究方法之一种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外部研究(社会历史研究)向内部研究(自足的形式研究)的转变过程。在形式研究狭隘的弊端阉限了视野之际,文学研究再次将眼界转向了外部。这次不是转向以往简单、机械的社会历史反映论和决定论,而是寻求文学与社会存在的各种关系的契合点。知识社会学为这一转向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具体而言,在探讨文学家地位与价值的研究领域,从其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历史及文化语境中的职能及其身份合理性视角切入,即在学理与方法层面引入知识社会学进行研究是一个有待展开的学术方向。缘此,我们将文学家(全面梳理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此仅以中国现代文学家境况为案例)视为一种有特定功能与身份,有特殊价值及生存方式的一类知识分子,与其生存并迁延的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作为阐释对象,力求得到一种立足于知识社会学基础上的合理解释。

我们意欲通过对知识分子诸界说梳理,进入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尤其是现代文学语境,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代表性作家的重点剖析,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家在不同时期的自我意识、身份地位、功能价值,及其形成的各种原因,旨在分析与探寻文学家的状况与出路。就文论现状看,从阐述文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合法身份并如何履行相应社会职能的知识社会学视角研

^① 按照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的著名论断,文学活动由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要素构成。参见[美]M. 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传统》,郇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究文学,仍处于理论建构与拓展研究视野的时期。有鉴于此,可以认为,运用知识社会学相关理论考察、探究文学家的社会、文化生存并阐释其特有功能及在社会中的身份合理性,既有学理意义上的可行性,又有学术意义上的可阐释空间。

早在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教授李安宅及其老师张东荪即把知识社会学介绍到了中国。李安宅以《孟汉论知识社会学》为题,把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第五编“知识社会学”译成中文,发表在1938年6月燕京大学出版的《社会学界》第十卷上。这篇译文后来又出了单行本,书名叫《知识社会学》,同时附录张东荪的《思想言语与文化》。该书不仅认为知识社会学是“包括一种体大思精的系统,代表一个崭新的领域”,而且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也许可以作为中国努力建设社会史、社会思想史的“指南针”。^①张东荪的文章对知识社会学有介绍,但主要的目标是通过批评“孟汉底体系”(即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而创建中国的知识社会学。所以,张东荪既是知识社会学的引进者,又是中国知识社会学的努力创建者。他的《思想言语与文化》一文,表达的就是一种完整的知识社会学观点。其主旨是证明“概念的知识”亦即“解释的知识”(包括政治思想、社会思想、道德见解、哲学思想、宗教理论、物理学等)是受到文化的左右,跟着文化走的。换言之,思想是受“社会情况”左右的,此“社会情况”既包括社会上无形或有形的势力,亦包括“很辽远的社会影响”之“暗中支配”。此种“辽远的影响”即是所谓“文化”。他以为西方人把自己的知识视为人类普遍的知识加以论究是不对的,因为西方人的知识仅是人类知识之一种。西方人的知识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知识存在。这就是“从社会学的研究知识”所得到的结果。

按照张东荪的理解,随着人类知识所受的三种限制中知识社会学所发现的“社会学的限制”(其余二种为康德所发现的“生物学的限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心理学的限制”)的产生,他的以建立“独立知识论”为主要目标的哲学体系最后完成,“知识社会学”被融入到

^① 李安宅:《知识社会学·译者弁言》,转引自《光明日报》2003年8月13日张耀南撰文。

“独立知识论”中,就是以“知识社会学”为立足点解释哲学以及哲学家的使命。张东荪认为,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有了文化的需要,就会有理论、哲学;理论的产生是基于文化、社会的要求,时代、要求一变,真理也就跟着变了,以前的真理便不再是现在的真理;哲学既是文化的产物,则文化到了不能不变的时候,哲学家就应该站出来做思想领导,“产生新的哲学家”^①。1949年以后,知识社会学在介绍方面有一些进展,但在自创方面进展缓慢。

国外(主要是西方国家)有关知识分子的研究在整个20世纪贯穿始终。自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展开阐释并进行不懈的践行开始,舍勒、曼海姆、葛兰西、布尔迪厄、福柯、萨义德等均有影响整个学术界的独创理论成果。知识社会学正是他们切入其中的一个重要理路。其中,曼海姆关于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的”理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尤其是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等理论成果对国内知识分子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国外学者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其中亦不乏涉及文学家境况)的研究,并有中文版本的著作主要有美国汉学家格里德尔的《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历时性地阐述了自春秋至20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在国家意识形态迁延中的命运,并以政治受害者这一“现代性的困境”作结。同样是汉学家的美国学者舒衡哲的《中国启蒙运动》,以“五四”启蒙中的新知识分子为阐释重心,其中文学家及其文学革命亦是论题之一。日本学者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半个多世纪中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为题,探求其在激荡漩涡中的心路历程。

从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专攻中国思想史的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及其国内收入许明主编的“中国知识分子丛书”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论》。虽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但其融汇中西之学术背景及现代视野的理论阐释赋予了这些成果独到的视角和创新的见解。学界评其“善于用现代的阐释把传统中有生

^① 张东荪:《哲学是什么? 哲学家应该做什么?》,转引自《光明日报》2003年8月13日张耀南撰文。